

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影响及挑战^{*}

□ 赵明昊 姜星宇

〔提 要〕 技术右翼兴起是近年美国政治变迁的重要现象。技术右翼秉持技术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技术民族主义等观念，主张依靠技术手段重塑政府治理模式，巩固美国技术领导地位并为自身谋利。美国政府与科技企业的利益博弈、美国政治极化、两党政策的差异，是技术右翼谋求更多介入政治的关键因素。通过助力政党竞选、担任政府要职、运用新兴技术和传播手段等多种方式，技术右翼日益渗入美国政治深层运作，冲击政党选民联盟，加剧美国政治极化，影响美国政治议程，并塑造美国科技战略与政策。技术右翼对政治的介入面临诸多制约，包括精英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分歧、商业逻辑与安全逻辑的错位、改革倾向与体制惯性的冲突，技术右翼的政治介入成效及其与共和党的联盟前景面临挑战。技术右翼兴起标志着美国政党、政府与科技精英互动模式的深刻变化，其影响和走向值得持续关注。

〔关 键 词〕 技术右翼、美国政治、右翼民粹主义、特朗普政府

〔作者简介〕 赵明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姜星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771.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26) 3 期 0063-29

^{*} 本研究得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课题研究项目资助。

近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共和党与美国内技术右翼（tech right）之间日益密切的互动受到广泛关注。技术右翼指秉持右翼意识形态、介入美国政治且彼此拥有社会网络联系的科技精英群体，其崛起反映了美国科技精英与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引发学界的研究与思考。既有研究从“技术鹰派”“硅谷右转”“硅谷军事化”等视角出发，探讨技术右翼兴起这一美国政治中的新现象及其成因，并分析其对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和科技政策的影响。^[1]但是，有关技术右翼对美国政治生态影响的研究仍很不足。本文力图厘清技术右翼的政治理念，梳理其形塑美国政治的手段与策略，探析其介入美国政治带来的影响与面临的挑战，有助于更好理解美国“技术—政治复合体”现象以及美国内部的深层变局。

一、美国技术右翼的政治理念及其行为动因

鉴于美国政治的“旋转门”机制，技术右翼既包含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的官僚，也涵盖投身科技研发、运营创新产业的企业家、风险投资者群体。美国技术右翼代表人物包括曾执掌“政府效率部”（DOGE）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参与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的印度裔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帕兰蒂尔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风险投资企业安德里森·霍罗威茨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简称a16z）创始人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曾任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

[1] 相关研究参见赵明昊：《技术鹰派、国家安全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1期，第115-132页；蔡翠红、李煜华：《科技右翼与美国科技安全战略转型》，《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3期，第3-34页；韩召颖、刘锦：《特朗普2.0时代硅谷右转的动机与限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第75-86页；史泽华：《技术右翼及其与特朗普2.0政府的互动》，《当代美国评论》2025年第3期，第25-44页；汪伟民：《美国科技右翼崛起与硅谷军事化——基于技术政治学的视角》，《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6年第2期，第18-35页。

政策主管的硅谷风险投资人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以及曾长期活跃于硅谷投资圈、深受蒂尔等硅谷科技精英支持的现任副总统万斯。综合以上代表人物的著述与观点，技术右翼普遍希望基于自身意识形态理念及其掌握的经济和技术势力，影响乃至塑造美国政府的相关内外政策，从而增进商业利益，实现政治抱负。其主要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技术至上主义理念，将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技术至上主义（technological supremacism）将技术视作解决人类社会所有挑战的核心手段。技术右翼势力秉持这种理念，致力于推动技术加速发展，认为这将大幅提升人类社会的发展效率。安德里森在其撰写的《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中称，人口、自然资源和技术可以促进增长，带来更高的活力和福祉；由于全球人口的萎缩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技术成为唯一能够实现永恒增长的引擎。^[1] 在技术右翼势力看来，技术的发展将带来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实现更理想的社会形态；确保技术的快速演进是最重要的，人文关怀和科技伦理底线应让位于技术发展。其认为，伦理要求会阻碍技术创新，是“技术的敌人”；科技伦理的产生源自对技术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刻板印象，技术发展必须走出所谓“自我施加的痛苦迷宫”，摆脱僵化的伦理束缚。^[2]

技术右翼势力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应服务于技术发展的需要，对政府的低效治理多有不满。马斯克等人激烈批评美国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存在大量无益于创新的监管措施。因此，技术右翼主张废除或削弱政府监管，以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展。技术右翼并不将垄断视作阻碍创新的因素，反而认为技术实力和资本力量雄厚的企业应制造垄断，从而在谋求盈利之余聚焦创新。^[3] 他们还主张，美国政府应与企业合作，共同助推科

[1] Marc Andreessen, “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 Andreessen Horowitz, October 16, 2023, <https://a16z.com/the-techno-optimist-manifesto/>.

[2] *Ibid.*

[3] Peter Thiel and Blake Masters, *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4, p.39.

技创新。相较于倾向远离政治的传统硅谷科技公司，技术右翼认为，企业应积极介入政治，利用政策扶持、政企利益关联促进科技企业的迅猛发展，实现先进技术研发的跃升。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高美国政府治理效能也是技术右翼的关切。马斯克主张由具有小政府理念和先进技术应用能力的小规模团队负责政府体制改革，而不是指望传统官僚去冲击“深层政府”（deep state）。例如，执政者可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筛查海量政府数据，识别存在欺诈和浪费的项目，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以精简机构、削减开支。2024年11月，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发布《DOGE 改革政府计划》，宣称借助先进技术审查政府机构颁布的联邦法规，在联邦官僚体系中进行大规模裁员，从而为美国纳税人节省成本。^[1]

第二，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理念，反对左翼进步主义文化。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认为个人自由至高无上，反对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行为，主张依靠市场力量进行资源配置。从维护个人自由这一基础出发，自由意志主义在经济层面反对监管企业，在政治层面批判保障公平的民主制度。技术右翼势力认为，民主制度意味着治理代表权的扩展、权力制衡和监督、收入再分配，这些制度设计损害自由市场体制对创新的激励。

事实上，很多技术右翼人士建立或持股的企业展现出漠视民主制度约束的特征。2021年11月，蒂尔在推广自由意志主义价值观的阿特拉斯学会演讲中称：“美国是一个被庸众占据关键机构的失败国家，这些机构束缚了人的自由，而自由意志主义的使命是找到‘摆脱所有政治形式’的途径。”^[2]蒂尔创立的数据分析公司帕兰蒂尔，也被指责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审查联邦政府掌握的美国公民数据，对个体之间的信息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侵犯个人

[1] Elon Musk and Vivek Ramaswamy, “The DOGE Plan to Reform Governme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0, 2024, <https://www.wsj.com/opinion/musk-and-ramaswamy-the-doge-plan-to-reform-government-supreme-court-guidance-end-executive-power-grab-fa51c020>.

[2] Peter Thiel, “2021 Atlas Society Gala Honoree,” Atlas Society, November 4, 2021, <https://www.atlassociety.org/video/the-2021-atlas-society-gala-peter-thiels-speech>.

隐私。尽管帕兰蒂尔公司宣称秉持中立，但其相关业务的不透明性仍遭到批评。^[1] 技术右翼坚持“破中有立”，认为美国的治理模式需建立在精英主导基础上，体现出“首席执行官治国”的倾向。例如，技术右翼的重要思想旗手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自视为君主主义者，宣扬“暗黑启蒙”（Dark Enlightenment）论，认为应建立一种类似于企业运营的、由首席执行官统治的治理模式。^[2]

此外，技术右翼反对维护“多元、平等、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简称 DEI）原则的左翼进步主义文化，认为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需要依靠“优绩主义”思想，而不应被 DEI 原则这类“觉醒自由主义”（woke liberalism）理念束缚。他们指责 DEI 政策增加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运营成本，造成“新种族主义”不平等现象。^[3] 马斯克多次公开将进步主义文化称为“觉醒思维病毒”（woke mind virus），认为进步主义文化反对精英主义、言论自由等美国传统价值观。^[4]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除技术右翼主导的企业外，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等硅谷科技巨头的意识形态立场也出现右转，以迎合特朗普打击自由派的倾向。例如，2025 年 2 月，谷歌宣布放弃其长期以来“从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中招聘更多员工”的多元化目标，^[5]

[1] Lena Ulbricht and Simon Egbert, “In Palantir We Trust? Regulation of Data Analysis Platforms in Public Security,” *Big Data & Society*, Vol.11, No.3, 2024.

[2] David Marchese, “Curtis Yarvin Says Democracy Is Done, Powerful Conservatives Are Listening,”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18/magazine/curtis-yarvin-interview.html>.

[3] Steven Overly, “What the DEI Backlash Means for Tech’s Next Generation,” *Politico*, August 12,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digital-future-daily/2024/08/12/what-the-dei-backlash-means-for-techs-next-generation-00173686>.

[4] Jon Levine, “Elon Musk and Bill Maher Criticize ‘Woke Mind Virus’ on ‘Real Time,’” *California Post*, April 29, 2023, <https://nypost.com/2023/04/29/elon-musk-bill-maher-slam-woke-mind-virus-on-real-time/>.

[5] Miles Kruppa, “Google Kills Diversity Hiring Targe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2025, <https://www.wsj.com/tech/google-kills-diversity-hiring-targets-04433d7c>.

亚马逊则在同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删除“包容与多样性”等表述。^[1]

第三，具有技术民族主义理念，坚定维护美国在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是美国推进大国竞争战略的产物，体现了美国精英对中国等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赶超美国的深刻焦虑感。这一理念主张美国政府通过更有力的政策限制他国技术崛起，增进美国“技术—产业”联动，强化国防创新生态，以不断提升美国技术优势。^[2]为维护自身技术垄断地位、获取更大商业利益，技术右翼主张摒弃以往硅谷企业的“政治中立”倾向，强调科技公司应与美国政府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以帮助国家赢得技术竞争；批评硅谷企业与国家政治“疏离”的心态和做法，认为这不利于关键技术创新和国家发展。对中国等“追赶者”，他们展现鹰派姿态，认为美国需强化“全政府”“全社会”模式，加大技术遏制，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主导地位。例如，帕兰蒂尔公司高管亚历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和尼古拉斯·扎米斯卡（Nicholas Zamiska）在《技术共和国》一书中指责硅谷向消费资本主义妥协，将企业目标聚焦于刺激消费和赚取利润，背弃为国家、为国防建设服务的使命。^[3]

在技术右翼看来，传统军工企业已经落伍，甚至阻碍军事技术变革，侵蚀美国国防创新生态。例如，马斯克长期批评国防部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1] Arriana McLymore, “Amazon Cuts Reference to Diversity from Annual Report,” Reuters, February 8, 2025,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amazon-cuts-reference-diversity-annual-report-2025-02-07/>.

[2] 相关研究参见 James L. Schoff, “U.S.-Japan Technology Policy Coordination: Balancing Techno-Nationalism with a Globalized World,” Working Paper fo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29, 202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0/06/us-japan-technology-policy-coordination-balancing-technonationalism-with-a-globalized-world>; Laura D’Andrea Tyson, *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2, p.154; 孙海泳:《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对华科技战》，《国际展望》2020年第5期，第46-64页。

[3] Alexander C. Karp and Nicholas W. Zamiska, *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New York: Crown Currency, 2025, pp.14-15.

合作的 F-35 项目过时且充斥浪费。^[1] 他们认为人工智能、云计算、无人机等技术已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支撑，帕兰蒂尔、SpaceX 等“新贵”企业应获得美国政府更多支持，力图在与传统军工复合体的竞争中攫取更大商业利益。^[2] 在外交政策上，技术右翼展现鹰派特征，主张加强遏压对手国家。^[3]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担任副国务卿、负责经济和技术相关对外政策制定的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曾供职于谷歌公司，是蒂尔小圈子成员，在 2023 年创立了旨在促进美国国会议员和硅谷科技精英沟通合作的“山谷论坛”（Hill and Valley Forum），并宣称硅谷在“中美科技冷战”中保持中立的时代已经结束，^[4] 试图围绕人工智能、半导体、关键技术供应链及对华战略竞争等议题凝聚政策共识，推动科技界与共和党决策层之间的互动。^[5] 曾任蒂尔资本公司（Thiel Capital）负责人的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出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2025 年 7 月，在回应外界对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允许英伟达 H20 芯片恢复对华出口、另一方面又提出加强 AI 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是否自相矛盾的质疑时，他明确主张继续限制美国尖端半导体流入中国。^[6]

[1] “F-35: Why Elon Musk Is No Fan of the Stealth Fighter Jet,” The Economic Times, February 14, 2025,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f-35-why-elon-musk-is-no-fan-of-the-stealth-fighter-jet/articleshow/118253969.cms>.

[2] Joey Roulette and Marisa Taylor, “SpaceX, ULA, Blue Origin Clinch \$13.5 Billion-Dollar Pentagon Launch Contracts,” Reuters, April 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spacex-ula-expected-clinch-multibillion-dollar-contract-key-pentagon-launch-2025-04-04/>.

[3] 赵明昊：《技术鹰派、国家安全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第 115-132 页。

[4] Jacob Helberg, “Jacob Helberg @jacobhelberg,” X, May 10, 2024, <https://x.com/jacobhelberg/status/1788928150233121074>.

[5] Eric Bazail-Eimil, “Trump Picks China Hawk to Be Top State Department Economic Policy Official,” Politico, December 10,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live-updates/2024/12/10/congress/trump-picks-china-hawk-helberg-to-be-top-state-department-economic-policy-official-00193683>.

[6] “Unpacking the White House AI Action Plan with OSTP Director Michael Kratsio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30,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npacking-white-house-ai-action-plan-ostp-director-michael-kratsios>.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右翼这一群体并非在近年凭空产生，其思想理念基础早已存在，并构成社会关系网络。蒂尔在1987年创办保守派刊物《斯坦福评论》（The Stanford Review），抨击美国校园中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思想。萨克斯以及后来担任数字移动支付企业贝宝公司（PayPal）高管的诺曼·布克（Norman Book）等人都曾在该刊物撰文。蒂尔和萨克斯曾合著《多样性神话》一书，批判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正确”现象。^[1]近年来，大国科技竞争加剧、美国政党政治极化、两党政策偏好差异等因素，加速技术企业的右转趋势及技术右翼政策影响力的上升。

第一，大国科技竞争推动美国政府加强与企业互动。长期以来，硅谷技术企业秉持“加州意识形态”（California Ideology）思想，保持政治中立，推崇技术解放和自由市场，反对权威和政府干预。^[2]然而，随着大国科技竞争趋势愈演愈烈，政府需要掌握关键和新兴技术的企业助力本国赢得科技竞争，技术企业则需要政府放松监管并帮助其扩张业务。美国为维护其技术主导地位，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化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重组，要求技术企业配合政府。^[3]在此过程中，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与高技术企业的联系日益紧密，形成技术—安全复合体。^[4]面对母国出口管制和东道国监管政策等内外挑战，技术企业需影响和塑造美国政府相关决策，寻求政府税收减免、长期合同等政策支持，以减轻政策性冲击，避免商业利益受损。技术企业与美国政府互动的加强，打破以往硅谷企业对所谓“政治中立”的坚持，为其更大程度介入美国政治奠定了基础。

[1] David O. Sacks and Peter A. Thiel, “The Diversity Myth: Multiculturalism and Political Intolerance on Campus,”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January 1, 1998, <https://www.independent.org/store/book/the-diversity-myth/>.

[2] Richard Barbrook and Andy Cameron,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cience as Culture*, Vol.6, No.1, 1996, pp.44-72.

[3] 韩召颖、刘锦：《特朗普2.0时代硅谷右转的动机与限度》，第75-86页。

[4] 赵明昊：《技术—安全复合体与美国对华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5期，第59-78页。

第二，政党政治极化促使技术企业主动塑造政治。近年来，美国两党意识形态立场差异愈发扩大，政治报复和政治不妥协现象加剧，秉持自由意志主义理念的科技精英对民主党的极端政策取向愈发不满。在与特朗普政府官员的私人信件中，安德里森批评 DEI 运动维护种族平等的激进诉求引发新的针对白人的歧视，并在“过去十年加速发展”，导致“我这一类人愤怒不已，不会再忍受了”。^[1] 在这种政策压力下，科技精英放弃在两党之间保持平衡的传统策略，试图主动塑造政策走向，以更好维护自身理念和利益。2024 年总统大选的选情变化推动科技精英主动支持共和党。在特朗普和拜登第一次辩论以及特朗普遇刺后，共和党民调数据迅速上升，民主党则陷入更换总统候选人的危机。在利益算计下，技术右翼在大选尚未结束时就公开支持特朗普及共和党，马斯克、萨克斯等科技精英利用自身影响力和媒体声量直接参与竞选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美国政治。

第三，两党政策偏好和承诺差异促使科技精英右转。出于获得竞选资金和网络宣传平台的考量，特朗普及共和党在竞选期间作出迎合技术右翼的政策承诺。特朗普本人转变对加密货币的消极态度，宣布其胜选后将大力支持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行业的发展。^[2] 共和党放松企业监管、降低企业税率的政策偏好，也迎合很多技术企业的诉求。相反，拜登政府对技术巨头展开反垄断调查，出台多项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监管举措，推动对未实现资本利得征税，缩小了科技企业的盈利空间，与技术右翼秉持的技术至上主义理念相悖。他们对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极为不满，担心民主党继续执政将损害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的发展，^[3] 因此选择靠近特朗普和共和党。

[1] Christiaan Hetzner, “Leaked Message Show Marc Andreessen Blasting Elite Colleges over DEI: ‘My People Are Furious and Not Going to Take It Anymore,’” *Fortune*, July 16, 2025, <https://fortune.com/2025/07/16/marc-andreessen-leaked-messages-dei-stanford-university-mit/>.

[2] “2024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uly 8, 202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2024-republican-party-platform>.

[3] Ben Horowitz and Marc Andreessen, “The Little Tech Agenda: Biden vs. Trump,” *Simplecast*, July 17, 2024, <https://the-ben-marc-show.simplecast.com/episodes/the-little-tech-agenda-biden-vs-trump>.

二、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的手段

技术右翼在美国科技圈内并不占据多数。硅谷联合风险投资中心（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2025 年调查显示，55% 的硅谷民众在 2024 年大选中投票给民主党，仅 23% 的民众投票给共和党。^[1]从政治捐款上看，以互联网行业为例，非营利组织 OpenSecrets 的调查显示，2024 年政治捐款排名前九的企业均倾向民主党，共和党获得的捐款仅为民主党的十分之一。^[2]尽管人数有限，但由一小群科技精英组成的技术右翼借助庞大的金融实力、密切的私人网络关系和高新技术优势，成为美国政治中新兴的重要力量。

第一，技术右翼通过为特朗普选举筹集竞选资金、实施精准选举动员等方式助力共和党竞选。由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竞选活动中的支出不受限制，美国大选的竞选资金规模逐届攀高，对赢得选举的作用愈发显著。因此，筹集资金用于发布竞选宣传广告、维持竞选团队运作、搜集分析民调数据等，成为两党候选人的关键较量。技术右翼助选资金庞大，并利用私人关系网络为共和党募捐，是其影响共和党领导人的重要手段之一。在 2024 年大选中，马斯克向特朗普及其他共和党候选人捐献约 2.88 亿美元，成为该次大选最大的政治捐款人。^[3]蒂尔则从 2016 年大选开始向特朗普及其他共和党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2016 年大选期间，蒂尔向特朗普捐款 150 万美元；在 2022 年中期选举中，蒂尔为万斯竞选参议员捐款 1500 万美元，是美国有史

[1] “2025 Silicon Valley Poll,” 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October 6, 2025, <https://jointventure.org/publications/institute-publications/2770-2025-silicon-valley-poll>.

[2] “Interest Groups: Internet Summary,” OpenSecrets, <https://www.opensecrets.org/industries/indus?ind=B13>.

[3] Trisha Thadani, Clara Ence Morse, and Maeve Reston, “Elon Musk Donated \$288 Million in 2024 Election, Final Tally Shows,”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1, 202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5/01/31/elon-musk-trump-donor-2024-election/>.

以来向单个参议员捐款的最大金额。^[1] 政治献金还从联邦选举延伸至地方层面。2025年4月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席位选举期间，马斯克向候选人布拉德·施梅尔（Brad Schimel）捐献超过2000万美元，以助力保守派法官控制该机构，创造地方选举政治献金新的记录。^[2]

此外，技术右翼作为共和党向其他企业家募集政治献金的重要渠道，为共和党政治人士与科技精英、商业大鳄之间的沟通提供平台。2024年6月，萨克斯与知名风险投资人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在硅谷举办筹款活动，为特朗普竞选筹集1200万美元资金。^[3] 这一筹款活动吸引了加密货币交易机构双子座公司（Gemini Space Station）创始人泰勒·文克莱沃斯（Tyler Winklevoss）和卡梅隆·文克莱沃斯（Cameron Winklevoss）、时任参议员万斯、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古姆（Doug Burgum）等具有科技行业背景的政商界人士参加。^[4] 万斯和伯古姆在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分别出任副总统和内政部长。不难看出，技术右翼致力于营造特定社交空间，推动政治人士和科技精英相互接触。

技术右翼还通过多种手段动员共和党潜在选民。^[5] 阿米什人（Amish）是主要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新教群体，其政治参与度长期较低，希望与现代

[1] “Billionaires and the Trump Admin: Peter Thiel,” Revolving Door Project, April 8, 2025, <https://therevolvingdoorproject.org/billionaires-and-the-trump-admin-peter-thiel/>.

[2] Savannah Kuchar, “Musk Spent \$20 Million on Wisconsin Supreme Court Race He Says He ‘Expected to Lose,’” USA Today, April 2, 2025,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25/04/02/musk-wisconsin-supreme-court-race-lose/82773557007/>.

[3] William Gavin, “Donald Trump Raked in Millions at a Silicon Valley Fundraiser Hosted by David Sacks,” Quartz, August 7, 2024, <https://qz.com/david-sacks-donald-trump-fundraiser-silicon-valley-tech-1851525573>.

[4] Alexandra Ulmer, “Trump Rakes in \$12 Million at Tech Fundraiser in Liberal San Francisco,” Reuters, June 7,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trump-liberal-san-francisco-high-dollar-tech-fundraiser-2024-06-06/>.

[5] Lora Kolodny, “Elon Musk’s Pro-Trump PAC Failed to Pay Swing State Petition Signers, New Suit Alleges,” CNBC News, May 14, 2025, <https://www.cnbc.com/2025/05/14/elon-musk-america-pac-didnt-pay-voters-who-signed-petition-lawsuit-.html>.

生活保持距离。马斯克主导的机构针对阿米什人建立地址数据库，向该群体发送竞选传单、广告牌和选民登记表。马斯克还资助阿米什人从交通不便的乡村地区前往投票站投票。^[1] 阿米什人在 2024 年大选中的投票率显著上升，体现马斯克帮助共和党进行选举动员的成效。^[2] 在 2026 年中期选举逐步展开的背景下，技术右翼也试图影响选情。安德里森与帕兰蒂尔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代尔（Joe Lonsdale）等共同建立名为“引领未来”（Leading the Future）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筹资超 1 亿美元，资助反对建立州级人工智能监管框架的议员候选人。^[3]

第二，技术右翼人士通过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直接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相较以往的科技精英，技术右翼对参与政治并不抵触，反而认为介入政治有利于塑造服务其利益的政策，促进美国科技和政治生态变革。万斯的经历集中体现了技术右翼从政治边缘步入白宫核心决策层的历程。万斯踏入科技投资领域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蒂尔旗下风险投资机构米特里尔资本公司（Mithril Capital）的负责人，后与科林·格林斯庞（Colin Greenspon）共同创立纳里亚资本公司（Narya Capital）。^[4] 2022 年，万斯在蒂尔、萨克斯等人大力支持下当选联邦参议员。2024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接受蒂尔的推荐，提名万斯为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担任副总统后展现了对技术加速主义的推崇。2025 年 2 月，万斯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发

[1] Tom Newton Dunn, “How Elon Musk Secured the Amish Vote for Trump,” The Times, November 18, 2024, <https://www.thetimes.com/world/us-world/article/amish-vote-elon-musk-trump-us-election-8lqx8t72v>.

[2] Daniele Curci, “Amish Voters for Trump? The Amish and the Religion Factor in Republican Electoral Politics,” The Conversation, November 5, 202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mish-voters-for-trump-the-amish-and-the-religion-factor-in-republican-electoral-politics-247869>.

[3] Nancy Scola, “The Campaign to Take Down Alex Bores Is Just the Beginning,” Politico, March 6, 2026,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6/03/06/alex-bores-ai-leading-the-future-anthropic-00797055>.

[4] Elizabeth Dwoskin et al., “Inside the Powerful Peter Thiel Network that Anointed JD Vance,”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8,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4/07/28/jd-vance-peter-thiel-donors-big-tech-trump-vp/>.

表演讲，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敦促欧洲国家避免对人工智能进行过度监管。^[1] 在萨克斯等技术右翼人士的推动下，特朗普上任后迅速废除拜登政府对人工智能实施严格监管的行政命令，^[2] 宣布启动 5000 亿美元投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星际之门”计划（Project Stargate），全面放宽技术管制措施。^[3]

马斯克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中引人注目的技术右翼人士，他在特朗普支持下以“特殊政府雇员”身份主导“政府效率部”。该机构推动联邦部门数据整合，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评测相关部门绩效、追踪联邦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揭示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存在的“欺诈”“浪费”等问题。“政府效率部”推动裁减大量联邦政府雇员，在联邦部门加快部署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项目以执行结构化、重复性的业务流程，减少冗员并提升行政效率。马斯克的很多行动带有显著政治性，“政府效率部”推动终止很多与 DEI、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成为特朗普改造联邦官僚体系、打击民主党和左翼意识形态的工具。2025 年 4 月，萨克斯与特朗普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成立会员制俱乐部“高管部门”（Executive Branch），邀请科技企业家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和顾问接触，强化科技精英对政治的干涉。^[4] 同年 6 月，赫尔伯格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称，技术供应链的脆弱性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严重风险，维持美国技术主导地位、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将是其作为副国务卿的

[1] J.D. Vance,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a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ion Summit in Paris, Franc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vice-president-the-artificial-intelligence-action-summit-paris-france>.

[2] “Removing Barriers to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removing-barriers-to-american-leadership-in-artificial-intelligence/>.

[3] “More Investment, More Jobs, and More Money in Americans’ Pockets,” The White House, March 2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3/more-investment-more-jobs-and-more-money-in-americans-pockets/>.

[4] Mike Allen, “MAGA’s Coming Clubhouse: Executive Branch,” Axios, April 28, 2025, <https://www.axios.com/2025/04/28/magas-coming-clubhouse-executive-branch>.

最高优先事项。^[1] 在2026年2月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的演讲中，克拉齐奥斯强调美国应培养更多本土科技人才，通过向全球派遣美国“科技繁荣军团”（Tech Prosperity Corps），引导更多国家采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以赢得对华竞争。^[2]

第三，技术右翼运用人工智能、播客等深度影响美国政治，展现科技精英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独特性。技术右翼倾向通过新兴技术开展政治活动，利用人工智能为共和党进行政治宣传，帮助特朗普政府达成相关政策目标。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帮助政党分析海量数据，捕捉选民的突出关切和政策偏好，构建定制化的选举宣传叙事以赢得选民支持。^[3] 技术在竞选过程中对选民观念的塑造作用日益增强，技术手段深入影响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突破传统科技企业秉持技术价值中立的路径。^[4] 马斯克拥有的、原名推特（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X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制造虚假信息，引导用户支持共和党的政策主张或对民主党展开污名化攻击。例如，在2024年10月美国东南部多州遭受飓风袭击后，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受灾图片在X上得到数百万浏览量，共和党人以此批评拜登政府应对灾害不力。^[5] 马斯克本人亦频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虚假信息传播，其在2024年8月将民主党总统候

[1] “Statement of Jacob S. Helberg: Nominee for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Growth,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June 10, 2025,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2b6dc080-c286-1b13-84e5-3c2b80b7457a/061025_Helberg_Testimony.pdf.

[2] “U.S. Promotes AI Adoption, Sovereignty, and Exports at India AI Impact Summit,”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releases/2026/02/u-s-promotes-ai-adoption-sovereignty-and-exports-at-india-ai-impact-summit/>.

[3] Sarah Hubbard, “The Role of AI in the 2024 Elections,” ASH Center of Harvard Kennedy School, December 5, 2024, <https://ash.harvard.edu/resources/the-role-of-ai-in-the-2024-elections/>.

[4] Boaz Miller, “Is Technology Value-Neutral?”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Vol.46, No.1, 2021, pp.53-80.

[5] Huo Jingnan, “AI-Generated Images Have Become a New Form of Propaganda This Election Seas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October 18, 2024, <https://www.npr.org/2024/10/18/nx-s1-5153741/ai-images-hurricanes-disasters-propaganda>.

选人哈里斯身穿带有苏联标志服装的图片上传到 X，用这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暗示哈里斯为社会主义者。^[1] 在特朗普再次执政后，技术右翼进一步借助人工智能等手段改造政府。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除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削减政府部门开支、裁减员工乃至废除政府部门外，还以自动化执行系统代替人力办公，减少冗杂办公流程。例如，为精简美国总务管理局（GSA）的员工规模并提高工作效率，“政府效率部”团队开发部署名为 GSAi 的聊天机器人（chatbot），通过该软件分析合同和采购数据，执行以往由人力完成的任务。^[2] 技术右翼还通过所掌握的技术手段推进特朗普政府政策议程。2025 年 4 月，帕兰蒂尔公司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签署合同，构建实时追踪移民流动的平台。^[3]

在技术右翼和共和党看来，美国媒体和学术界长期持有偏左翼立场，使其难以通过主流媒体开展政治宣传。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曾以“防止煽动风险”为由封禁特朗普的私人和官方账号。在此背景下，二者携手创建和扩展自己的发声渠道，以放大保守主义政策话语的影响力。特朗普在 2022 年 2 月创办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万斯和蒂尔在 2021 年 5 月投资保守派视频网站 Rumble。^[4] 技术右翼还通过收购大型社交媒体平台，调整算法推荐以拓展保守主义理念的宣传渠道。2022 年 4 月，马斯克收购推特，裁减包括内容审核团队在内的约 75% 员工，取消禁止仇恨言论和虚假信

[1] Sarah Fortinsky, “Musk Posts Fake Image of Harris in Communist Garb,” The Hill, September 3, 2024, <https://thehill.com/policy/technology/4859664-elon-musk-fake-image-kamala-harris/>.

[2] Makena Kelly and Zoe Schiffer, “DOGE Has Deployed Its GSAi Custom Chatbot for 1,500 Federal Workers,” Wired, March 7, 2025, <https://www.wired.com/story/gsai-chatbot-1500-federal-workers/>.

[3] Sheera Frenkel and Aaron Krolik, “Trump Taps Palantir to Compile Data on American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30/technology/trump-palantir-data-americans.html>.

[4] Keach Hagey, “Peter Thiel, J.D. Vance Invest in Rumble Video Platform Popular on Political Righ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9, 2021, <https://www.wsj.com/tech/peter-thiel-j-d-vance-invest-in-rumble-video-platform-popular-on-political-right-11621447661>.

息等规定，并解禁特朗普的账号。^[1] 技术右翼非常善于借助播客采访方式宣传其政策理念，利用这种新兴传播手段争取年轻选民支持。例如，赫尔伯格在担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期间，多次与播客主播对谈，炒作中国科技公司的“安全威胁”，为国会推动禁用 TikTok 法案造势。^[2] 萨克斯长期主持播客节目，并在担任总统高级顾问后继续借此宣传特朗普政府政策。^[3] 由乔·罗根（Joe Rogan）主持的播客节目在美国拥有广泛影响力，约 81% 听众为男性，56% 听众在 35 岁以下。^[4] 马斯克多次在该节目宣传自己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阐述削减政府开支、消除监管等工作的重要性。^[5] 这类基于播客的政策传播对共和党巩固基本盘、赢得年轻选民具有关键作用。

三、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的影响

通过助力政党竞选、担任政府职位、利用新兴技术宣传政策理念等多种路径，技术右翼势力深度介入美国政治，助推特朗普和共和党赢得 2024 年大选，在政党选民联盟、政党政治格局、政治议程设置等层面对美国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直接推动了美国科技战略和政策的调整。

第一，技术右翼冲击美国政党选民联盟，技术力量成为嵌入联盟内部的

[1] Kate Conger, “How Elon Musk Changed the Meaning of Twitter for User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10/27/technology/elon-musk-twitter-year.html>.

[2] “Interview with Jacob Helberg on US National Concerns over TikTok and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YouTube, April 3, 20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8MoQI5ASlg>.

[3] Chamath Palihapitiya et al., “All-In with Chamath, Jason, Sacks & Friedberg,” Apple Podcasts, <https://podcasts.apple.com/cn/podcast/all-in-with-chamath-jason-sacks-friedberg/id1502871393>.

[4] Christien Pheby, “Who’s Listening to 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Men, Mostly,” YouGov, October 4, 2023, <https://yougov.com/en-gb/articles/47483-whos-listening-to-the-joe-rogan-experience-men-mostly>.

[5] Joe Rogan and Elon Musk, “Joe Rogan Experience #2281 - Elon Musk,” YouTube, March 1, 2025, <https://www.youtube.com/live/sSOxPJD-VNo>.

重要支点。在传统美国政党政治中，两党在保有自身选民基本盘的同时，都尽可能寻求扩大支持群体，构建更大的选举联盟。政党选民联盟的转变成为左右美国选举走向和政党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技术右翼对政党政治的深刻介入，使技术力量在重塑和扩大政党选民联盟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传统上，硅谷科技精英更偏向支持民主党，认同民主党在环保、DEI 等方面的进步主义思想，并获民主党政策扶持。而技术右翼在 2024 年大选中发挥关键作用，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日益高调，成为共和党选民联盟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OpenSecrets 等调查机构数据显示，科技巨头在 2024 年大选期间向特朗普捐赠 2.73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马斯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仅获得 1.21 亿美元捐款，双方差距明显。^[1]

技术右翼对共和党的竞选影响，体现在其推动构建拥有多元支持群体的“特朗普联盟”，^[2]促使部分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倒向共和党，冲击民主党原有选民联盟。技术右翼掌控庞大资本和重要技术手段，政党需要依靠技术右翼支持应对选举竞争，政党与科技精英之间形成新的权力互动模式。^[3]凭借对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控，技术右翼在竞选过程中为政党放大声量，巩固共和党选民基本盘并拓展潜在支持群体。X 在马斯克接手后日益成为右翼群体表达观点的重要平台，通过投放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宣传广告，更加精准地影响共和党选民群体。此外，技术右翼的助选使共和党在 2024 年大选中获得少数族裔选民支持，帮助特朗普最终赢得七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传统上拉丁裔选民倾向支持民主党，但皮尤研究中心（Pew

[1] “Who Are the Biggest Donors?” OpenSecrets, <https://www.opensecrets.org/elections-overview/biggest-donors>; Raphael Hernandez, Lauren Aratani, and Will Craft, “Revealed: The Tech Bosses Who Poured \$394.1M into US Election - and How They Compared to Elon Musk,” The Guardian, December 7,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4/dec/07/campaign-spending-crypto-tech-influence>.

[2] 王浩：《“特朗普联盟”的挑战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25 年第 8 期，第 27-45 页。

[3] 周冉：《美国科技公司崛起下的数字地缘变局：一种权力嵌合的分析》，《国际安全研究》2025 年第 4 期，第 126-156 页。

Research Center) 民调数据显示, 特朗普在 2024 年大选中获得 48% 的拉丁裔选票, 较 2020 年 (36%) 显著提升; 哈里斯仅获 51% 的拉丁裔选票, 较 2020 年拜登的得票率 (61%) 明显下降。^[1]

第二, 技术右翼助推政治极化, 导致两党选民政治立场愈发对立。技术右翼在支持共和党过程中加剧政治极化, 增大两党选民对立程度。技术右翼的媒体传播手段制造信息茧房和政策“回音壁”, 推动意识形态立场相近的选民聚集, 固化两党选民群体间对立。例如, X 放宽虚假信息监管、传播右翼保守言论等做法对保守派选民影响明显。马斯克掌握该公司所有权 12 小时后, 平台上含有冒犯黑人词汇的帖文激增近 500%,^[2] 其用户主体和舆论导向出现“右转”。平台用户对事实核查账户的兴趣大为降低, 与事实核查员和客观媒体账户的互动量分别减少 52% 和 27%, 可信度较低媒体账户的受关注度则上涨 22%。用户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中左翼媒体的关注度下降 16%, 对《国会山报》(The Hill) 等较为中立媒体的关注度下降 27%。^[3] 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数据显示, 51% 的共和党用户认为在 X 上体验良好, 仅有 20% 的民主党用户持有相同看法; 31% 的用户认为该平台更倾向支持保守派观点, 仅有 5% 的用户认为平台更支持自由派观点。^[4]

[1] Hannah Hartig et al., “Behind Trump’s 2024 Victory, a More Racially and Ethnically Diverse Voter Coalition,”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6, 2025,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5/06/26/behind-trumps-2024-victory-a-more-racially-and-ethnically-diverse-voter-coalition/>.

[2] Rashawn Ray and Joy Anyanwu, “Why Is Elon Musk’s Twitter Takeover Increasing Hate Speech?”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ember 23,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y-is-elon-musks-twitter-takeover-increasing-hate-speech/>.

[3] Gita Johar, “Elon Musk and Twitter: How He’s Turned X into a Free-for-All—and Here’s the Proof,”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February 13, 2024, <https://business.columbia.edu/insights/digital-future/elon-musk-and-twitter-how-hes-turned-x-free-all-and-heres-proof>.

[4] Michelle Faverio and Monica Anderson,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on X Differ over the Site’s Politics and Their Experiences,”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5, 2025,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5/06/05/republicans-and-democrats-on-x-differ-over-the-sites-politics-and-their-experiences/>.

技术右翼助推政治极化和选民对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引发民主党强烈反击和社会公众批评。技术右翼在资本、游说等手段外，运用社交媒体技术塑造民众政治观念和政治议程走向，形成新的政治介入手段。技术右翼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不仅未能发挥民主制衡与调和作用，反而加剧政治极化和权力膨胀，侵蚀美国政治制度。技术右翼对政治的干预成为两党斗争新议题，技术右翼也成为民主党攻击共和党的的重要靶标。民主党抨击技术右翼与共和党的联盟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甚至指责技术右翼帮助特朗普和共和党建立“专制政权”，呼吁美国民众反对技术右翼的政治介入。^[1]

第三，技术右翼改变政治议程设置，其理念偏好和利益关切日益嵌入美国国家治理体系。技术右翼在介入政治的过程中塑造政治议程，将自身关心的议题置于政党内和政党间辩论中。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使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瓦斯普”共识遭到冲击，文化一身份议题逐步成为美国政治发展和政党重组的核心解释变量。^[2] 技术右翼在美国“文化战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兴起。在蒂尔、万斯、马斯克等人的影响和支持下，特朗普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打击左翼推崇的“觉醒自由主义”。此外，技术右翼与共和党合力推广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宣扬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有诸多契合之处。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令，以南非政府对该国白人民众构成“种族歧视”为由削减对南非援助。^[3] 这一政策与马斯克指责南非政府对白人农

[1] Zephyr Teachout, “When Will Democrats Finally Realize that Big Tech Is Not an Ally?” *The Guardian*, November 27,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4/nov/27/democrats-tech-google-apple-musk-trump>.

[2] “瓦斯普”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简称（WASP），代表白人精英主义文化和美国白人新教徒在政治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参见王浩：《从周期到认同：美国政党政治研究的范式创新与议程重置》，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6页。

[3] “Addressing Egregious Ac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7,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ddressing-egregious-actions-of-the-republic-of-south-africa/>.

民实施“种族灭绝”相呼应。^[1] 作为白人，马斯克、蒂尔、萨克斯三位技术右翼的代表性人物都有在南非生活的经历，他们认为白人力量被削弱是南非经济竞争力下滑的重要原因。南非白人民权组织“非洲论坛”也大力寻求美国右翼支持。“南非叙事”成为美国政治的某种隐喻，技术右翼希望美国避免重蹈南非覆辙。

技术右翼在文化身份议题、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构建微妙联系，将对民主党和左翼的批评投射到政府治理缺陷议题上。与萨克斯共同主持播客节目的风险投资人戴维·弗里德伯格（David Friedberg）称，提高能源产量是降低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拜登政府的监管制度限制了美国的能源生产。^[2] 技术右翼人士普遍反对民主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安德里森认为，左派的气候政策是“去增长”（degrowth）和“反增长”（anti-growth）的，美国具有能源独立的能力，技术可以在应对能源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3] 在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巨量能源的背景下，技术右翼支持放宽对传统能源的开采。特朗普与共和党将能源价格视为美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并以之作为攻击民主党的议题。^[4] 由此，技术右翼与共和党建构了左翼意识形态破坏美国增长、损害民众福祉、削弱美国竞争力的叙事。此外，技术右翼将美国的技术主导地位与国家安全挂钩，构建政府和企业深度合作以应对大国技术竞争的叙事逻辑，宣扬放松对科技企业监管等理念。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很多政策举措都体现了这种诉求。

[1] Mithil Aggarwal, “How a Land Law Sparked Elon Musk’s Accusations of ‘Genocide’ Against His Home Country,” NBC News, February 10, 2025,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south-africa-racist-white-farmers-trump-musk-genocide-ramaphosa-rcna190749>.

[2] Derek Robertson, “How the Tech Right Wants to Run America,” Politico, December 10,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digital-future-daily/2024/12/10/how-the-tech-right-wants-to-run-america-00193596>.

[3] Marc Andreessen, “Marc Andreessen: It’s Morning Again in America,” Hoover Institution, January 14, 2025,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marc-andreessen-its-morning-again-america>.

[4] 宋国友、肖方昕：《经济依然优先：摇摆州经济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研究》2025年第1期，第38-63页。

第四，技术右翼深度参与美国科技政策制定与执行，使其“安全化”取向更为显著。塑造有利于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是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的重要目标。与拜登政府的科技政策理念不同，技术右翼主张大幅放松政府监管，为科技企业减税。技术右翼推动特朗普第二任期大规模废除拜登政府制定的技术监管措施，将“去监管化”作为美国科技政策的导向。2025年7月，克拉齐奥斯和萨克斯共同主导制定《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这是特朗普政府提升美国科技和产业优势的核心战略文件，放松监管以加速人工智能创新是该计划三大核心支柱之一。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向企业和公众征集阻碍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的联邦法规信息，配合相关联邦部门放松监管措施。^[1] 技术右翼还推动美国政府利用在区块链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加快布局加密货币和数字资产，确保美国金融科技霸权。2025年2月，萨克斯与美国国会两院涉及加密货币政策的委员会共同成立工作组，聚焦稳定币（Stablecoin）等数字资产的相关立法问题。^[2] 3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财政部负责推进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和“数字资产储备库”。

技术右翼势力渲染大国科技竞争的激烈性，进一步推动美国科技政策的“安全化”趋势。^[3] 卡普等人将美国技术优势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石，主张美国科技企业应主动配合政府，以更深入的官民力量融合压制“敌对国家”的技术崛起。^[4] 2025年2月，万斯在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称，一些“专

[1] “Winning the AI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 The White House, July 2025, p.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07/Americas-AI-Action-Plan.pdf>.

[2] “House Announces Week of July 14th as ‘Crypto Week,’” The 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 July 3, 2025, <https://financialservices.house.gov/news/documentsingle.aspx?DocumentID=410793>.

[3] 王帆：《基于优势理念的美国霸权战略及其局限》，《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6期，第35-50页。

[4] 赵明昊：《保守民粹主义崛起：特朗普冲击与中美长期战略博弈》，《外交评论》2025年第1期，第66-91页。

制国家”正将人工智能技术武器化以破坏他国国家安全，警告那些欲与“专制国家”合作的国家不会获得长远收益。^[1]在技术民族主义理念和“安全化”叙事影响下，特朗普第二任期出台多项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加剧大国科技竞争。^[2]2025年12月，赫尔伯格主导提出“硅和平”（Pax Silica）倡议，邀请英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参加，试图在关键矿产与能源、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领域打造一体化的科技—产业联盟，抗衡中国影响力。^[3]2026年2月，万斯在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上主导推出“关键矿产价格底线”等安排，力图构建更有韧性的关键矿产供应链。^[4]上述举措体现出技术右翼以“安全化”逻辑干预市场，加速推进大国科技竞争的理念与策略。

四、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的挑战

技术右翼对美国选举政治、政府政策制定、选民观念塑造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已成为塑造美国政治的新兴力量。然而，技术右翼对政治的介入也面临不少局限性因素，如精英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分歧、商业逻辑与安全逻辑的错位，以及改革倾向与体制惯性的冲突等。技术右翼介入美国政治的实际效果和未来走向仍有不确定性。

（一）精英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分歧

特朗普重返白宫得益于其利用“让美国再次伟大”旗号，统合中西部选

[1] J.D. Vance, “Remarks by the Vice President a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ion Summit in Paris, France.”

[2] “Winning the AI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 The White House, p.21.

[3] Tripti Lahiri and Shan Li, “U.S. Builds Tech Bloc to Counter China, Adds India as Newest Memb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0, 2026, <https://www.wsj.com/world/india/u-s-builds-tech-bloc-to-counter-china-adds-india-as-newest-member-44afdc60>.

[4]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Delivers Remarks at the Critical Minerals Ministerial,”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4, 2026, <https://www.whitehouse.gov/videos/vice-president-jd-vance-delivers-remarks-at-the-critical-minerals-ministerial/>.

民基本盘、摇摆州选民和技术右翼等群体，建立起庞大的政治联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内部各群体的利益取向和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不同群体在政策偏好、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不少矛盾。技术右翼作为由科技精英群体组成的利益集团，在促进科技创新、提高经济效率等方面拥有共同目标。而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建制派政客、跨国企业长期损害普通民众利益，主张清除“深层政府”、维护本土工作岗位并加大对跨国企业的监管和制约。因此，技术右翼与民粹主义基本盘之间具有重大利益分歧，技术右翼在介入美国政治过程中受到精英利益凌驾民众利益的质疑。

技术右翼与民粹主义群体之间的利益分歧，决定了二者的政策主张难以兼容。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移民、税收、企业监管、关税等政策议程面临内部阻力。以移民政策为例，技术右翼背后的科技企业利益集团需要从全球获取研发人才和高技能劳工，因而支持特朗普政府的 H-1B 工作签证政策；然而，民粹主义群体普遍持反移民立场，认为特朗普政府应优先保护本土劳工的就业机会。特朗普任命持有 H-1B 签证的风险投资人斯里拉姆·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为白宫人工智能政策高级顾问，引发右翼民粹主义人士批评。右翼民粹主义旗手人物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抨击 H-1B 签证以牺牲美国人工作为代价，主张废除该签证类别，马斯克则针锋相对指出 H-1B 签证对美国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两人一度爆发充满火药味的争论。^[1]此外，技术右翼与民粹主义群体在税收、企业监管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右翼民粹主义人士指责美国的科技企业利益集团并不真心支持“美国优先”议程，担心科技精英借助政策影响力谋求私利，主张对工薪阶层减税并对富人增税；

[1] “Steve Bannon Says H1-B Visa Program Is a Scam of the Highest Order, Asks Donald Trump to Revisit the Law that Was Enacted in 1990,” The Economic Times, January 1, 2025,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us/steve-bannon-says-h1-b-visa-program-is-a-scam-of-the-highest-order-asks-donald-trump-to-revisit-the-law-that-was-enacted-in-1990/articleshow/116834257.cms>.

而技术右翼希望特朗普政府延续对企业的减税政策。^[1] 特朗普政府宣称通过“关税战”促进制造业回流、增加工作岗位，最终惠及美国劳工阶层，但关税政策对美国科技企业利益造成直接损害，苹果、亚马逊、特斯拉等公司的供应链成本上升。^[2] 马斯克与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围绕关税政策爆发激烈争吵，^[3] 暴露特朗普政治联盟的内部矛盾。

技术右翼的精英属性及其凌驾民众利益的诉求，也引发民主党抨击。民主党将技术右翼与共和党的联盟视作对美国民主制度的重大威胁，指责技术右翼借其掌握的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帮助特朗普“集权”并规避民主监督，损害美国民众利益。^[4] 2025年3月，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举行选举，马斯克及其关联政治团体投入2100多万美元支持保守派法官候选人施梅尔，自由派候选人苏珊·克劳福德（Susan Crawford）称之为“针对民主前所未有的攻击”，指责马斯克“试图购买州最高法院席位”。^[5] 最终克劳福德胜选，保住自由派法官在该机构的多数地位，反映美国民众对技术右翼、亿万富翁干预政治的不满。

（二）商业逻辑与安全逻辑的错位

作为由科技行业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组成的利益集团，技术右翼倾向

[1] Steve Inskeep, “Steve Bannon Says MAGA Populism Will Win—as Trump Is Surrounded by Billionaires,” National Public Radio, January 19, 2025, <https://www.npr.org/2025/01/19/nx-s1-5254112/donald-trump-elon-musk-steve-bannon-inauguration-day-2025-billionaires>.

[2] Ari Levy, “The Biggest Questions Facing Big Tech Ahead of Earnings,” CNBC News, April 21, 2025, <https://www.cnbc.com/2025/04/21/tech-earnings-trump-tariffs-tesla-apple-alphabet-meta-microsoft-amazon-nvidia.html>.

[3] Sophia Cai, “Musk Berates Trump Trade Guru Navarro as a ‘Moron’ amid Tariff Turmoil,” Politico, April 8,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4/08/musk-navarro-fighting-00277994>.

[4] Suyash Pasi, “Big Tech’s Shift to the Right,” Human Rights Research Center, March 28, 2025, <https://www.humanrightsresearch.org/post/big-tech-s-shift-to-the-right>.

[5] Nicholas Riccardi, “Democrats’ Win in Wisconsin Court Race Also Is a Big Loss for Elon Musk,” AP News, April 3,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wisconsin-supreme-court-elon-musk-81f71cdda271827ae281a77072a26bad>.

将商业管理的逻辑引入国家治理，以提升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导向。然而，企业经营的商业逻辑追求利益最大化，难以满足分配正义、权力制衡、维护国家安全等国家治理的需求，必然与政府运作的安全逻辑产生龃龉。即便在技术右翼内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科技精英也有不同利益考量。技术右翼人士大多主张政府减轻对企业的监管和反垄断压力，蒂尔甚至将企业创新等同于走向垄断的过程，认为垄断才是生产力。^[1]然而，放宽反垄断监管或不利于中小型技术的发展，甚至可能产生技术创新停滞、安全风险扩散等负面效应。因此，一些技术右翼人士倾向保持反垄断压力以维护经济安全。例如，万斯曾支持拜登政府时期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Lina Khan）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并主张拆分谷歌等科技巨头。^[2]安德里森提出“小科技”（Little Tech）议程，力图为初创企业争取更多空间。马斯克则以 Open AI 公司存在反竞争行为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3]此外，技术右翼人士在技术风险管控、技术伦理等方面也存在分歧。蒂尔、雅文等认为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发展将提高社会生产力，使所有人受益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诸多社会弊端；而马斯克称，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巨大风险，甚至可能导致“文明的毁灭”（civilization destruction）。^[4]

技术右翼对政治的干预还引发外界对其商业利益损害国家安全的质疑。

[1] Peter Thiel and Blake Masters, *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 p.39.

[2] Ethan Dodd, “JD Vance Hints Elon Musk, FTC Chair Lina Khan Could Be in Trump Admin: ‘I Agree with Them Both on Some Issues,’” *California Post*, October 15, 2024, <https://nypost.com/2024/10/15/us-news/j-d-vance-hints-elon-musk-and-lina-khan-could-be-in-trump-admin-i-agree-with-them-both-on-some-issues/>.

[3] “Elon Musk et al. v. Samuel Altman et al.,”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January 10, 2025, <https://www.ftc.gov/legal-library/browse/amicus-briefs/elon-musk-et-al-v-samuel-altman-et-al>.

[4] Clare Duffy and Ramishah Maruf, “Elon Musk Warns AI Could Cause ‘Civilization Destruction’ Even as He Invests in It,” *CNN*, April 17,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4/17/tech/elon-musk-ai-warning-tucker-carlson>.

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非完全一致，技术右翼与公权力的深度结合难免出现利益冲突，损害权力制衡原则，并引发国家安全风险。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尽管以削减联邦政府开支为目标，但其聚焦政府发包合规机制的改革被外界质疑是为了维护马斯克名下企业私利。《纽约时报》记者调查发现，“政府效率部”相关行动使针对马斯克旗下企业的32项联邦调查陷入停滞。^[1]此外，还有声音批评“政府效率部”派到联邦机构执行调查工作的年轻工程师获取大量敏感数据，不仅有损公民个人隐私，还可能造成国家秘密泄露。由于技术右翼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商业利益，他们在政府中的职位会否威胁国家安全引发关注。2025年5月，马斯克等科技精英随特朗普访问中东地区。期间，美国科技企业与中东国家签署高达6000亿美元的协议，包括向中东国家出售数十万枚美国先进芯片、与中东国家合作建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2]国会议员质疑，这种合作尽管基于商业利益考量，但可能造成美国先进技术和产品经由中东国家流向中国、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风险”。^[3]

（三）改革倾向与体制惯性的冲突

技术右翼势力秉持技术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理念，主张运用人工智能等高技术手段大幅改造政府体制。然而，美国的三权分立传统对行政部门具有诸多制约，联邦政府官僚体系也力图抵制技术右翼的行动。在制度惯性束缚下，技术右翼难以达成改造政府的目标。^[4]在特朗普支持下，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提出到2026年削减1万亿美元政府开支的计划，试图整

[1] Algernon Austin, “DOGE Is Helping Musk’s Businesses While Hurting the American Peopl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March 18, 2025, <https://cepr.net/publications/doge-helping-musk-hurting-people/>.

[2] Juliana Liu, “On Middle East Tour, Trump Touts US Tech to Power Post-Oil Future,” CNN, May 14, 2025, <https://www.cnn.com/2025/05/14/tech/us-ai-chips-trump-saudi-arabia-visit-intl-hnk>.

[3] “Letter to Rubio and Lutnick on UAE Chips and AI_5.19,” Senate Democrats, May 19, 2025, https://www.democrats.senate.gov/imo/media/doc/letter_to_rubio_and_lutnick_on_uae_chips_and_ai_519.pdf.

[4] 韩召颖、刘锦：《特朗普2.0时代硅谷右转的动机与限度》，第75-86页。

治联邦政府内部的欺诈、浪费等弊病。“政府效率部”在未经安全许可的情况下访问美国国际开发署、财政部支付系统等政府机构的机密信息，通过解雇或延期辞职计划裁减国税局、国防部等机构的大量员工。外界质疑，“政府效率部”并不具有裁减联邦政府员工的合法权力。2025年2月，14个州的检察长起诉马斯克、“政府效率部”和特朗普政府，指控对马斯克的任命和“政府效率部”运作违反宪法有关权力制衡和重要官员须经总统提名及参议院批准的条款。^[1]在“政府效率部”要求联邦政府雇员提交工作进展报告后，国防部、国务院、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均指示部门员工暂停回应此要求，体现“政府效率部”和既有联邦机构之间的矛盾。

技术右翼改造美国政府治理模式和内外政策的雄心，也面临美国联邦制和政党政治的束缚。一方面，一些共和党政客不满技术右翼的做法。众议长约翰逊等人批评马斯克对《大而美法案》的反对态度，^[2]不希望技术右翼完全控制共和党的政策议程。不少共和党议员也抱怨，“政府效率部”削减福利等行动使其在地方选区面临压力。^[3]另一方面，技术右翼成为民主党攻击对象，其倡导的科技政策遭到民主党主导州的反对。民主党人士指责技术右翼削减政府开支、重组政府机构的行动违反美国宪法及《隐私法》等法律，并提起诉讼。部分州还通过州层面立法抵制技术右翼的政策主张，监管其企业经营活动。例如，纽约州通过《停止隐藏仇恨法》，要求社交媒体公司每年向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交两次报告，说明平台现行服务条款是否对仇恨与

[1] “Attorney General Bonta Sues Trump Administration, Challenging Elon Musk’s Unconstitutional Exercise of Power,” State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bruary 13, 2025, <https://oag.ca.gov/news/press-releases/attorney-general-bonta-sues-trump-administration-challenging-elon-musk%E2%80%99s>.

[2] Mychael Schnell, “Speaker Johnson Calls Musk Criticism of Trump Agenda Bill ‘Terribly Wrong,’” The Hill, June 3, 2025, <https://thehill.com/homenews/house/5330887-speaker-johnson-elon-musk-trump-agenda-bill/>.

[3] Alexander Bolton, “GOP Senators Vent Musk Frustrations at Closed-Door Meeting,” The Hill, February 27, 2025, <https://thehill.com/homenews/senate/5166003-tech-billionaire-elon-musk-government-jobs/>.

极端主义言论、虚假信息进行审核；^[1] 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等州立法要求大型人工智能企业披露其开发实践中的安全风险，并评估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算法歧视情况。此外，民主党将反制马斯克等技术右翼的相关做法与制衡特朗普和共和党的行动联系起来，借此凝聚党内共识并明确政治议程。例如，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等民主党议员聚焦立法限制“政府效率部”对政府机构的访问权限、阻止特朗普政府削减关键政府开支等。^[2] 民主党进步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人将全面暂停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视作“捍卫民主制度”的重要举措，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部署缺乏有效监管并可能造成大规模失业，需要“所有人而不只是亿万富翁来决定人工智能的未来”。^[3] 左翼力量在全美发起的反马斯克、反特斯拉示威活动得到民主党组织的协调和资金支持。^[4]

五、结语

近年来，技术右翼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其秉持技术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技术民族主义等理念，谋求以右翼保守意识形态塑造美国政治，主要手段包括助力共和党竞选、担任政府重要职位，以及运用新兴

[1] “Stop Hiding Hate Act,” Office of the New York State Attorney General, December 23, 2024, <https://ag.ny.gov/resources/organizations/social-media-tos-reporting/stop-hiding-hate-act>.

[2] “Dear Colleague re: Ongoing House Democratic Caucus Activity,” Democratic Leader Hakeem Jeffries, February 3, 2025, <https://jeffries.house.gov/2025/02/03/dear-colleague-re-ongoing-house-democratic-caucus-activity/>.

[3] Bernie Sanders, “Sen. Bernie Sanders @SenSanders,” X, December 16, 2025, <https://x.com/SenSanders/status/2001057004370948131>; Kevin Robillard, “The Coming War over AI Will Define the 2026 Midterms,” Huff post, December 31, 2025,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uk/entry/the-coming-war-over-ai-will-define-the-2026-midterms_n_6953f7fbe4b06a970133dfb7.

[4] “Exposed: The \$124 Million Democrat Machine Behind Anti-Tesla ‘Grassroots’ Protests,” Fairfax Republicans, April 1, 2025, <https://fairfaxgop.org/exposed-the-124-million-democrat-machine-behind-anti-tesla-grassroots-protests/>.

技术和传播手段宣扬政策理念。技术右翼对政治的干预冲击美国政党选民联盟，加剧政治极化，深刻影响美国科技战略与政策。然而，技术右翼归根结底是一种精英利益集团，其与右翼民粹主义群体存在分歧，这股势力推崇的商业逻辑与国家治理之间也并不完全适配，其政治介入面临不少挑战。

技术右翼崛起反映美国国内极化加剧和保守主义政治周期回归的趋势。科技精英从美国政治幕后走向台前，标志着传统的政府—企业互动模式发生深刻转变。如何与技术企业、科技精英开展互动，已成为美国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关键议题。短期看，技术右翼深度嵌入特朗普政府政治活动，能够影响美国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政策。长期看，技术右翼能否延续其政治影响力，将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共和党能否维系包含技术右翼和民粹主义群体等利益集团的“特朗普联盟”，使技术右翼继续依托共和党参与政治活动；共和党能否在未来选举中维持本党优势，使技术右翼继续塑造美国内外政策；美国政府与持技术右翼立场的高技术企业互动会否受到有效制衡。

【责任编辑：吴劲杰】